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環境的社會性象徵

The Environment as a Social Symbol: Within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Perception

doi:10.6154/JBP.1987.3.013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3), 1987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3), 1987

作者/Author : 畢恆達(Herng-Dar Bih);Donald Appey Ard

頁數/Page : 225-23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1987/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87.3.01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第三卷 第一期 民國七十六年九月 翻譯 第 225 頁~ 234 頁

BULLETIN OF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VOLUME 3, NUMBER 1, SEP. 1987, TRANSLATION, pp. 225-234

## 環境的社會性象徵\*

畢恆達譯\*\*

THE ENVIRONMENT AS A SOCIAL SYMBOL: WITHIN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PERCEPTION

by L /  
DONALD APPEYARD  
translated by  
HERNG-DAR BIH\*\*

---

\*原文為 "The Environment as a Social Symbol: Within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Perception" 載於 J.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79, 45, 143-153.

\*\* D. Appleyard 原為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都市與區域規劃系及地景建築系教授，於 1982 年 9 月因車禍去世

• 重要著作有：Planning a Pluralist City (1976) 與 Livable Street (1981)

\*\*\* 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環境心理學系博士班肄業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ogram,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Manuscript received on March 10, 1984.

\*by Donald Appleyard, "The Environment as a Social Symbol: Within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Action and Percep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79; 45: 143-153. 1979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Program,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S.A.

倫敦邦鎮 (Barnsbury) 的一條街道被如此“改善”：種植樹木、拓寬人行道、設置座椅並降低交通量。但是根據後來的訪問顯示，居民卻認為狀況反而變得較以前為差，這是甚麼原因呢？主要乃是因為工人階級所居住的鄰里被“仕紳化”了。中產階級開始移入，而原有的居民則視此改善為邦鎮被查爾斯化 (Chelseaization) 的象徵，就像舊金山的居民也曾為該市曼哈坦化而抗議一樣。新的高層建築無論設計的多好，總會被安上舶來品的標籤。這是當前環境衝突的主要課題。

「社會意義」也同樣的困惑着環境認知的研究。大家都知道，浪濤拍擊海灘即使和繁忙的交通具有同樣大的音量，但是人們對海浪與交通的認知卻極為不同，此乃因一是發自自然，一是人為的緣故。因此，“我們自己”所產生的噪音、灰塵、氣味、建築、標誌與交通，就遠比大自然所產生的更加難以忍受了。

環境專業者與環境科學家往往不瞭解環境的象徵內涵與計畫的象徵本質，並且經常抹殺了環境的意義。環境專業者常視環境為實質的存在、機能的容器、貨物或商品的聚集、社會活動或計劃的場所、感官的經驗或是自然的生態系統，但是卻極少將環境視為社會或政治的象徵。環境心理學者着重的是環境知覺的向度，包括刺激的特質、結構與變化；社會生態學者則視環境為人們安排社會模式的毫無特徵的平面 (Firey, 1947)。在許多的實例裡，為了以技術、非政治的手段處理環境問題，因而有意的貶低環境的象徵意義。

此種忽視，使得人們不易將環境視為社會媒體。專業者驚訝於他們所提的計畫，竟然被當作是他們的象徵。環境態度的詮釋與環境品質的測量在社會意義的冰山上瓦解了。實質規劃的社會性批評於1960年代達到了高峯 (Webber, 1963; Gans, 1968)，並且針對社會與實質概念的分裂。社會象徵意義的概念、實質環境與社會政治結構的連結，則為重建其間連結的方式。

在現代的大都市裡，面對面的社會接觸受到限制，而新聞媒體只能傳達「重大」的事件。流動的市民經常處身於不熟悉的環境裡，只能靠外觀來揣測所發生的事情。他成為被動的觀察者，無力控制所見事物的形式。這種情形逐漸有些改變。目前對環境的關切，特別是鄰里的行動主義者，已經開始扭轉對於都市的被動的美學觀點，實質環境已成為從生產轉移到消費的政治奮鬥的焦點。其中心課題為環境是誰的、誰的領域被侵犯、誰是自己人、誰是局外人。而終極的關切則是為了個人認同、團體認同、地位及權力而爭鬥。

當環境被認知或意指為某個人或某個社會團體的代表、當社會意義扮演較其他功能更為重要的角色時，環境就

成為社會象徵。因此下面兩者就變成社會象徵意義的一體兩面。(1)環境行動有意的要傳達社會意義 (Mead, 1934; Edelman, 1971)。(2)無論是否有意，而環境被視為社會象徵。

這個比道格拉斯 (M. Douglas, 1973) 的「濃縮象徵」(Condensed symbols) 的界定更為廣義，涵蓋了整個行動或人們。在她的界定裡，高層建築可以視作企業權力的象徵，而人民公園則是青年反叛或環境運動興起的象徵。但是這裡的界定，卻認為從社會的角度來看，環境的任何部份都可以成為象徵 (註一)。這是象徵的口語用法。例如幾年前紐約客雜誌裡的一篇文章會描述，一幢名叫卡維達 (Kawaida) 的高層公寓 (初看是義大利的名字，但其實是非洲斯華希里人 (Swahili) 的名字)，如何悄悄的由義大利人所控制的規劃委員會通過，成為紐澤西州紐瓦克城 (Newark) 義裔美人領域裡的第一個黑人所擁有的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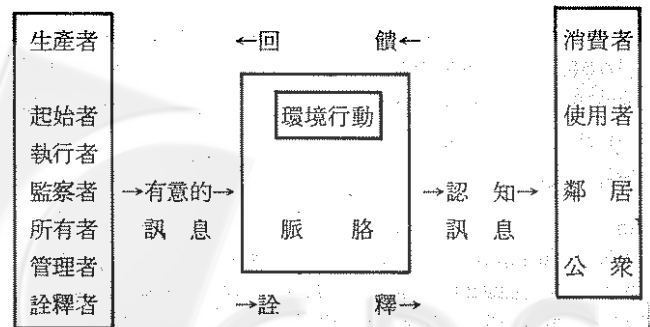
根據紐瓦克城義大利政治領袖的分析，卡維達大廈並不是供黑人居住的公寓，而是作為當地黑人領袖巴拉卡 (I. Baraka) 的權力根據地，甚至市民對巴拉卡動機的看法也可以說明此建築已獲得象徵性的勝利——在義大利人的領域裡，黑人也有政治見解和組織能力以興建炫耀的，由稅收所支持的公寓建築。(Trillin, 紐約客, 1972, 12, 20, 62-65)。

作者更暗示這個象徵可能加速白人遷至此地。可見象徵擁有多大的權力。

本文嘗試將象徵的角度放在較為廣闊的環境行動與認知的理論裡，以解釋不同的行動者——生產者、管理者與使用者——在以實質環境為媒介而發生的象徵互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闡明環境及其想像在政治與心理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從一個簡單的描述假想環境行動的溝通模型 (圖一) 開始。

圖 1 環境行動的溝通模型



## 環境生產者與管理者

環境行動的「起始者」從築籬種樹的個人到主要的開發者、地主、公家機構與私人行號。環境「執行者」則是實際影響環境改變的人，包括環境專業者、營建商以及其他設計、建造或破壞地點的人。

在現代社會裡，那些改變環境的人已不再有絕對的自由。其行動受到監察者的限制。監察者可能是環境保護或其他利益團體、規劃或其他公家機構及委員會、政治人物或是法院。他們可能反對環境的改變、建立準則、仲裁衝突或解釋公共利益，且經常關心行動的脈絡。環境所有者與管理者對於環境有較直接且持續的影響。除了地主外，還包括警察、消防人員、垃圾收集工人以及維護環境與控制周遭環境的公司或公家機構的職員。

環境詮釋者對於政治與環境認知的影響力有漸增的趨勢。記者與新聞評論家撰寫並出版旅行手冊；研究者、學者與作家揭露新的環境訊息；編輯與出版專業期刊的人員也都是環境的詮釋者。他們改變了環境認知，因此在未直接介入環境的情況下，塑造了公眾意見。

環境行動者循序漸進的介入環境，在行動萌芽、生長、成熟與衰亡時，影響其方式與意義。由於這些輸入，使得環境的意義變得模糊。一個人或團體可以在不同的時間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規劃師可以提出建議、加以執行，並且在其他時間審查計畫或詮釋環境資訊；在家裡他則可能反對地方的開發、興建車庫或砍伐樹木。但這些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生產者所意圖傳達的訊息、環境行動與消費者所接收到的訊息或知覺，是連結環境生產者、管理者與消費者的主要活動。詮釋者傳達有關環境行動的解釋給社會大眾，大眾再將此訊息與直接的環境知覺體驗加以整合。雖然大多數的環境溝通都是單向的，但接收者常經由新聞媒體而有不同型的回饋，包括正面的、負面的、適應的、環境的或是政治的。

### 有意的訊息

環境生產者的意圖與行動，受其所做決定之社會與環境脈絡的影響。因此在行動開始時，他是環境的消費者。環境行動背後的意圖常指向自我、行動或他人。（圖二）大多數環境行動者公開的意圖都著重在其行動本身，包括技術性以及經濟性的，例如在合理的成本下提供足夠的空間與住所。以市場觀而言，環境只不過是用以獲利的買賣商品。技術觀則促發現代建築功能主義運動，以及土木工程、土地使用與運輸規劃的意識型態。此種意識型態缺乏自覺且忽略與他人之間意圖的溝通。行動本身變成只是技

圖 2 環境行動背後意圖之取向

| 自我<br>(生產者) | 行動 | 他人<br>(消費者) |
|-------------|----|-------------|
| 自明性         | 技術 | 引人注意        |
| 權力          | 美學 | 傳達訊息        |
| 地位          |    | 指示          |
|             |    | 關切          |
|             |    | 說服          |
|             |    | 審慎          |

術性的操作。當然其動機最後總是與他人有關；但除非對象已明確的予以界定，否則技術主義只是在做「環境」工作而已。

有時候行動的美學品質就是其主要目的，優美建築或城市的建造本身就是意義所在，無關乎誰是創造者或是觀賞者。雖然美學也牽涉其他意義，但是由環境行動的美學觀所衍生的抽象品質，如秩序、空間、質感、比例或變化本身就有價值（Appleyard, 1979c）。

但自明性、權力與地位等動機對行動有更大的影響力。環境行動可以反映、擴充或縮減生產者對自明性或實際權力的感覺。“我在這裡”的陳述，根據其簡性、資源與需求，可以從平靜的自尊到傲慢的表現。

維佈倫（T. Veblen, 1899）在「有閒階級理論」裡談到一旦能滿足生活所需，甚或更好時，為了與他人爭勝，免不了製造許多引人注目的閒暇與浪費性的消費。當社會較進步時，由於漸增的短暫接觸需要更吸引人的展示自己形式的方式，因而奢華揮霍是比閒暇的消費更好的競爭方式。後來的社會學者也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葛夫曼（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達」（1959）指出人們有選擇性的以社會行動的戲劇演出方式來展示自己。「前台」與「後台」的區別是很重要的，前台是演出的場所，後台則是擺設道具，從事演出準備的地方。近年來，地理學者鄧肯（Duncan, 1976）也嘗試解釋為何有些人比較依賴展示自己。其假說乃是那些處身於不被穿透的社會團體中的人，包括原有的上流階層、已奠立基礎的富人到穩定的工人階級與小城社區，因為已建立了認同，所以不太需要展示自己。而那些通常是在都市文化裡，屬於容易被穿透的團體的人們，如暴發戶、新移民者、社會流動或居住流動性較大的人，則比較依賴展示。雷朋（Raban）在那本摧毀了規劃師認為都市乃充滿秩序之地的迷思一書（軟性都市）中，也主張所有的都市生活都具有這種品質。

絕大多數的都市生活都透過象徵。信仰、思想或可買賣物體的持有，對於表達、界定自我與都市的關係，特別是界定衛道者與非人性的外來者或敵對者關係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或許是都市迫使我們採用這些方法，或許我們在不知不覺間或並無必要時就已採用了。（Raban, 1974, p.128）。

但是展示的需要並不止於與人競爭而已。在不安定的團體與個人認同受到威脅的世界裡，展示是必須且穩定的自我反映。有的時候，人們視自我認同比生存更為重要，遑論舒適與金錢。

展示需求的差異可能也是我們在環境裡常很難發現真正的權力在那的原因之一。真正的社會精英並不需要展示，事實上他們常有意的隱藏自己。同時我們也被那些爭取被認可的人所困擾。環境展示常與權力有著相反的關係。外觀很少提供社會現實的線索。上層階級常住在隔離的地產上，最大的土地所有財團常用各種方法加以偽裝，例如利用財產契據來為街命名。軍事基地與中央情報局則隱藏在沙漠與森林裡。莫斯科的特權商店就像其二百個監獄一樣的難找（Solzhenitsyn, 1978）。要發現誰擁有甚麼以及權力在那裡，需要極大的調查智慧。

當然也只有“有權者”才有選擇誇示甚麼的自由。貧窮與無力的團體則因被忽視及有意的壓制而隱藏消失（Goodman, 1971）。

曼徹斯特的規劃為富人設想到如此的程度，那些富豪可以從家裡經由最近的路線到達市內辦公的地點。此路線整個穿過勞工階級居住的區域，但是對於道路兩旁如此接近的苦難與骯髒卻可以不予理解。……主要街道的兩旁幾乎都是中低階層所開的商店。為了自己的利益，那些店主必須維護商店外面的整潔與體面的狀況，事實上他們也真做到了。……從主要通道的狀況很難對緊臨著街道後面的勞工居住區有個真實正確的描繪。（Engles, Manchester in 1844）

獵人角（Hunter's Point）、洛鎮（Roxbury）或哈林區也是相同的狀況，它們不是隱藏在高速公路系統的後面，就是一閃即逝。窮人，就像監獄、垃圾場、污水系統與工業區，總是躲在都市的背後——克雷（G. Clay, 1973）稱其為藏污納垢之所——正如豐饒的農業與其勞工總是躲在英國的鄉村住宅柵欄的後面（Williams, 1973）。窮人並不總是追求認同，至少在大規模的國民住宅裡是如此（Newman, 1972）。

規劃設計者也強調其行動的表現品質，並非是個人表現，而是其思想或社會價值觀的表現。諸如在結構或生態上的民主、自由、選擇、公正、誠實與整合。部份的原因

是傳統上在公共環境裡的個人表現是被認為不適宜的。藝術家允許在作品中表達情感（雖然公共雕塑仍受到爭論），但規劃師、設計師與工程師卻很少談到個人表現，因為這是自我中心與非理性的，因此也就是非專業的。動機應該被抽象的技術主義、經濟學與美學所遮掩。這種失去個性的環境行動特別是被那些由委員會所指導的公家或私人機構實現。此種環境計劃的惡名本質已漸漸被社會大眾棄絕，他們不喜歡缺乏人性的建築環境，卻發現都市已變成毫無個性的地方。沒有個性的時尚可能比充滿個性的時尚還要糟。

環境生產者視其行動為技術、經濟、美學與象徵等多功能的混合體。有些環境行動，如政治行動（Edelman, 1971），純粹只是象徵性的——讓人們深信行動美意的一種虛假態度。在貧窮國家裡，國民住宅根本無法滿足住宅的需求，因而被認為只是象徵性的行動。在西歐，住宅確是有效的福利計畫，但貧窮國家只是一種借用其形式的無知姿態。在秘魯或印度，這都是虛偽的象徵。國家與都市裡充滿特權象徵，如誇張的辦公大樓、昂貴的捷運系統與多功能的鋼鐵工廠。但是我們可以如此輕易的嘲笑其奢華的浪費嗎？政府與社區賦予它們此種重要意義，使它們成為文化生活中必要的部份，不惜花費巨資以維護其驕傲與自明性。何況金錢真是那麼重要嗎？

訊息有時也訴諸特定的對象。環境行動者與生產者所持之對象的概念決定了其所傳達的訊息。在商場上，消費團體的分類與確認日趨重要。甚至環境專業者也開始視社會為分化而多元的。過去顧客被當成「一般人」——如人們、市民或大眾。這種模糊不加以區別的顧客並不怎麼需要專業。他可對顧客的需求加以浪漫的想像，不必為直接面對顧客而感到煩惱，然後將自己偏愛的夢想投射到世界上。甚至今天，人們仍期望能以理想的方式使用環境，在廣場上聚集，依自己的意思活動。慶幸的是他們並不經常要求如此高水準的生活。

鄰居（居住在受環境行動影響的周圍的人）也要求被考慮，當他們在會議或報紙上發表意見時，環境的提案人就必須與他們溝通。計畫變得搖擺不定，受到各種不同團體需求的左右，包括業主（站在一邊），鄰居（站在另外一邊），爭取發言權的使用者，社會團體以及國際期刊（Appleyard, 1977）。

行動的其他取向還有好幾種形式。表面上看可能是引人注意、傳達訊息、指示、關切、說服或審慎的。較深層則可能是推銷一個人、一個機構、一個觀念或商品，或是企求社會控制、教育，或者只是娛樂而已。

吸引他人注意是彼此溝通的前提。除非人們已收到訊息，否則無從溝通。如果要他人尋找、辨認地點，則此地

點必須發出某種信號。引人注意的必要性，決定於其公共意義與潛在服務對象對此地點的熟悉程度。但其最主要的動機則是想推銷某種事物。

指示訊息較關切社會控制，大都使用文字，引導都市更平穩的運作。但更有效的社會控制乃經由領域的界定、防禦與驅逐。牆、籬與記號告訴人們是否可以進入此領域。有時候，僅僅需要小記號或鋪面稍微變化，以建立所有權與管轄權並拒絕不速之客。

在小社區裡實質環境傳達資訊的功能還沒有直接的社會溝通來得重要。居民彼此認識，社區各部份的功能大家都知道，因此並不需要記號。當都市變得複雜、模糊與無節制時，人們就更依賴清楚的報導、指南、記號與展示，以瞭解此地何地與何處會發生何事。速度越快、陌生人越混雜時，號誌也越大。都市本身是一巨大而充滿變化的展示，個人往往只能窺見一角。環境的一個新的功能是教育兒童與觀光客去學習他人的文化與次文化。

關懷人們是環境行動最基本的動機。關懷的環境試著傳達親切、感動、自信、庇護與舒適，就像主人款待客人。遠離、封閉與超尺度無法傳達關懷的感覺。而似奴隸般的討人喜歡，雖然惹人憐愛，但終必令人厭惡，就像狄斯奈樂園一樣。

要說服他人時，只能表現好的以及對人有利的一面。這是一場複雜而欺騙人的遊戲。外表與實體是何種關係？何者是真理？當說服的技巧越精巧時，大眾也就越加懷疑外觀而渴求尋得真實。社區對環境計畫的懷疑從未曾如此之高。

審慎、和善有禮與親近關係在小社區裡常很重要，這也是不注重誇示的原因。大都市裡的商業中心、娛樂中心與辦公區的禁制已經被擺脫。徹底的誇耀受到稱讚，但「要求合宜」的力量逐漸增強。設計評論與環境衝擊評估單位，受到社會大眾以及受計畫影響者的刺激，不得不更加審慎。文化的優勢者總是謹慎的，如今也將其限制加在別人身上。審慎表示低調、與周圍環境協調、關心他人的自明性與福祉。高速公路轉入地下；建築物的尺度縮小；消除地景的不和諧；控制標誌；將陳述隱藏在風景之後。

## 環境行動與脈絡

環境行動涵蓋了所有人類加諸環境的改變，如增建、改建、拆除或保存。其尺度從極小的短暫行動，如油漆房屋、設立號誌等輕環境（light environment）到重環境（heavy environment），如大尺度的開發計畫或新市鎮。當我們閱讀都市時，輕環境顯得特別重要，因為它比經常是已過時的重環境更接近當時社會行動的表達。一個人若想瞭解一住宅區，則觀察窗戶的裝飾、人行道整潔與否

、或草皮是否修剪，會比注意房子的形式與尺度更為有效。

環境行動形成此種語言的元素。個人行動除了外貌、手勢和衣着外，還包括傢俱、汽車、船隻等。最基本的環境行動則是標示領域、營造建築與運輸系統。

領域控制，特別是經由所有權，是一種隱藏的環境行動，所有權沒有可見的符號以資辨明。土地與戶外空間的所有者，透過人的出現、邊界定、開墾形式或管理符號，發出領域權力的信號。都市公共領域的控制，青少年對都市公園輪流佔據（Suttles, 1972），或住宅區街道與鄰里空間權力的相互衝突（Appleyard, 1979b）是環境行動中最短促而備受爭議的議題。

相反地，建築物與運輸系統則是較固定的象徵表現。其形式為最初的建造者所賦予，原有的意義則可能已經喪失。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會經由小的改變，如將房子漆成不同顏色，以獲取認同，但仍主要依賴最初的選擇更勝於後來的行動。

環境行動如何表達認同、權力和地位？如何傳達給人？要瞭解傳達須先瞭解都市認知。最簡單的訊息，也是個人、公司、公家機構、都市及國家所不斷從事的，即權力與聲望的傳達。其先決條件為可見性（visibility）與可意象性（imageability），在觀看者的心板上烙下顯著的意象（Lynch, 1960）。兩者都為攫取注意所必須。

可見性決定於可及性（access）與區位。好的可見性有如電視的黃金時段或報紙的頭版。它有賴於人潮的出現，觀看的能力與停留的時間。傳統上，最易見到的區位是圍繞人群聚集的地點以及市中心區的主要廣場，林蔭大道的端點，或都市的入口。天際線容易從開放空間、河岸或周圍的小山見到。可見性最主要的來源是動線系統；交通最擁擠的路線也就是資訊最多的管道（Appleyard, 1976）。

一旦被見到，行動就可以在人們心裡建立持久的意象。最有力的方式是驚奇與獨特。如果一個行動能夠與緊臨環境不同且在整個都市中顯得突出，則吸引注意的機會就高了。但是只具備「獨特」本身是不夠的。「大小」常被用來當作權力的象徵。都市及國家仍然以擁有全球最大的建築物吹噓。金氏記錄（McWhirter, 1976）所列之全世界最大的建築，提供我們有關國家價值觀的有趣線索。美國有最大的商業大樓與娛樂中心，同樣地也有最大的獨戶住宅與污物處理廠。其他國家也分別追求各自的聲望。蘇俄有最大的大使館（在北京），最大的旅館與最大的雕像；慕尼黑有最大的啤酒銷售機構；英國則有最大的有人居住的城堡。

古羅馬或現代蘇俄的大尺度雕像；美國生活裡事物的尺寸，從汽車、公路到傢俱、酒杯，使這些文化顯得獨特而不朽。都市尺度本身，如「大」都市，也成為國家地位

的來源。倫敦之控制成長計畫，或許與其國際地位之衰落或因已漸趨成熟有關，美國對控制成長的新興趣可能也是此因。「小即是美」的價值觀預示著傳統、權力語言的結束。

高度和長度是物體大小的性質，莫斯科有全世界最高的發報塔。東柏林的塔雖然是為了俯臨西柏林，仍小心的蓋得比莫斯科的矮了幾尺。蘇卡諾在雅加達興建自由之塔，比自由女神像稍微高了一點。紐約和芝加哥興建最高建築的競爭也是同樣的道理。當建築高度受到營建技術的限制時，長度也成了地位的象徵。凡爾賽宮與列寧格勒冬宮的立面，巴黎鬧區與聶城（Nevsky Prospekt）的風景使得低矮建築也永久流傳。現代美國的都市擴張與通勤距離也成為地位的象徵。

利用輪廓或邊界以隔離行動或地點，使之不溶入背景。用牆、柵欄、門或樹籬界定領域，或用空間將建物或郊區分隔，可確保其自明性與獨立自主。過去有權勢者的邸宅也是用此法將之隔離。將有權者與群眾隔離是必要的象徵手段，以防止渲染，避免群眾學習其可置疑的私人行為（King,1976）。隔離的追求在美國都市達到極致。幾乎所有新的建築，與遍佈的獨戶住宅都設法與周圍環境隔離；運輸系統也將不同的車輛分開。都市環境的粉碎可能就是由於象徵的環境溝通取代了直接的社會溝通。

顏色、質感、式樣與形狀都是用來表現區別的其他方法。義大利王宮用白色石頭建造，使得在大眾灰泥建築中顯得特別突出。倫敦的波特蘭石頭只用於較好的辦公建築。舊金山銀行刻意選用深色以在環境中突顯出來。質感、式樣、比例、材料的豐富與品質，以及裝飾的程度都是表達聲望的語言。區別與獨特是關鍵的因素，如華麗環境中的樸素立面或樸素環境中的裝飾性建築。就如語言一樣，形狀、輪廓、光線和座標都可用來為權力服務。

年代的象徵意義起了很大的轉變。直到最近，現代作風仍意味著進步與聲望。但是在能源與運輸的領域裡，高度技術的魅力受到挑戰。如今即使共產主義者也認為老的就是高雅的。在波隆那（Bologna）人們甚至主張“保守就是革新”（Bandarin,1979）。

柏格（J.Berger,1972）認為油畫的發展是為展示了財富，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前面所提到的建築性質，在技術與美學的偽裝下，其實隱藏著權力的傳達。這可能顯得過分強調，但到何種程度呢？

當然並非人人都想展示權力。前述的性質也被用以達到相反的目的，如利用低可見度，隔離或溶入環境之中，以避免注意。權力不是唯一可傳達的訊息。環境的內涵也可獲致個人或團體認同的表達。這是環境行動中最重要、也是最無形，最容易被人遺忘的品質，它影響內在品質與

地點感。環境可以是俗麗的、優雅的、沉默的、華麗的、愜動的、無人性的、年青的或成熟的，決定於其式樣、細部、植栽、傢俱、招牌、維護、顏色、材料及其他性質。這些都是傳達美學和語意訊息的管道（Moles,1966）。一位心理學家（Ehrenzweig,1965）曾寫道，油畫的筆觸和音樂的滑音傳達的美學品質較形式佈局為多。城市也是如此。金屬與發亮的玻璃，即使形式和質量與自然材料一樣，所形成的環境卻截然不同。但是在計畫與公眾會議上又討論多少呢？

建築有如人（Ackerman,1961），建築師如此看待，大眾也如此認知。好的人格特質在建築上也受人喜愛。例如舊金山的居民正在節食，就偏愛瘦長的建築。環境態度受到環境起始者多少影響？我們依賴建築外觀以解釋背後之性質到何種程度？如果拿兩張舊金山旅館的照片給學生看，一個是虛飾、閃閃發光的，另一個則用混凝土建造，可以想見的，學生會認為飲酒作樂發生在前面的旅館，而較高貴的行為則發生在後面的旅館，這仍有待證實。

環境是行動與事件漸變的集結。景色、區域、鄰里、中心、系統與都市等元素形成了環境脈絡。環境行動的意義由其本身與脈絡共同創造。可見性決定於區位，以及形態和功能的獨特。行動的獨特性雖有加強效果，但也須冒著被視為外來入侵的危險。當美國人開始考慮都市脈絡時，就更關心此種佔有的入侵。

環境因此是具有造句與語意結構的溝通語言。它不如口語語言清晰，因此不易閱讀，但仍有些佔有、形式、使用和區位的法則，幫助他們去解釋都市認知。從另一方面來說，文字可能與指涉對象的形體無關，環境卻能與所傳達訊息的形態相似。重要的地點可以看起來重要，機場可以像鳥。因此語言學的策略，如直喻和隱喻的使用也受到鼓勵。

## 詮釋

我們從孩童時代就已開始學習詮釋環境。兒童讀物裡對各種不同景色特質的描述就是環境密碼的基本參考架構。建築物有門、窗、牆及屋頂；學校通常有許多大教室，戶外的鋪面、遊戲設施與一大群兒童。我們的環境認知就被這些標籤所支配，藉著意識的努力及設計教育而視都市環境為一美學的外表，如顏色、質感、量體與形式。

環境詮釋的角色變得如此重要以致支配了我們大部份的環境經驗。新的環境計畫被支持者廣為宣揚，在新聞報刊上加以評估，以及在會議上公開討論。這些詮釋者創造了迷思。環境行動被命名並安上標籤，而視之為陳述概念如社區、保存、整建或衰落。形容詞也被採用了，如真正的、新的、虛假的、傳統的與異國情調的。高樓建築被稱

為雞蛋盒、蟻丘和檔案櫃。范裘利為現代建築加上了標記“鴨子”。

詮釋對於都市認知的影響仍值得研究。這個或許就是專業者與社會大眾環境態度的主要差別。

## 環境使用者：都市意象

林區 (K.Lynch) 於1960年提供我們一瞭解與操作都市環境的語言。他辨明認知元素，探討在不同的都市中如何建構，並研究可意象性的品質。雖然他儘量避免意義的問題，但是後來的研究發現，社會與功能意義與可意象性同樣都是都市認知的重要因子 (如Gulick, 1963; Appleyard, 1976)。

與生產者相同，社會大眾亦從實質環境中尋求滿足與溝通。除了訊息、服務、可居性與美學之外，他們將環境解釋為行動的證據、他人的存在與自我的反映。環境在何時主要被視為社會象徵？這就是我們此刻的興趣所在。

圖3 來自環境行動之滿足與溝通

| 他人   | 環境  | 自我  |
|------|-----|-----|
| 社會象徵 | 訊息  | 自明性 |
|      | 服務  | 權力  |
|      | 可居性 | 地位  |
|      | 愉悅  |     |

本文前段會提到，社會意義在環境發生衝突時到達頂點，或是環境衝突發生在社會意義特別敏感的時候。古典的環境衝突為家園受到外來的入侵。一個漸增的環境衝突的顯著特徵是孿生迷思 (twin myths) 的出現，一個聲稱環境行動乃是外來之人所為，總是有點罪惡；另外一個則說受到威脅的環境是屬於我們自己的，所以是善良無邪的 (Appleyard, 1976)。從芝加哥與紐約引入的高樓建築使我們所心愛的舊金山“曼哈坦化”。誠然適量的仇外是創造社區感的有效辦法 (Suttles, 1972)，這些迷思，無論是否為真，在面臨環境威脅時都有助於凝結政治選民的力量。然而靜默的變遷與環境脈絡，可以看做偶發或自然的；可見及可察覺的環境行動則較清楚是社會意圖的結果。但是時日一久，他的來源就會因歷史的複雜性而逐漸模糊、以至被淡忘了。

從這些衝突看來，家園 (home environment, 指鄰里、社區及其他被認同為家的環境) 是最容易被視為充滿象徵的 (Appleyard, 1978a)。異鄉 (distant environment) 則較無象徵意義。距離效應是我們地點認知中基本的因素，特別是對計劃者而言，因為我們總是隔著一段距離來

看待別人的家園。一如甘茲 (H.Gans, 1968) 所說，計劃者比較像觀光客而非居民。

家園糾纏著我們對之的修正與適應，因而成為我們自己的一部份。鄰近環境 (neighboring environments) 屬於他人，卻較令人頭痛，因為它構成家的氛圍，而我們卻無法控制它。它能破壞我們的視景，惡化環境品質，製造噪音等。無怪乎，人們會選擇居住在友善的鄰里。

家的概念可以從住宅擴展到社區、都市與國家。地點的認同決定於其具有的特質。當外來的特徵侵入時，我們有失落的感覺。他們被加上「舶來」的標籤，如果他們想複製當地的性格則被認為是虛偽的代用品。甚麼是當地的，甚麼是外來的，是維持社區或國家固有箇性的規劃法令與政策的中心課題。許多國家對「美國化」產生敵意是可想見的。同樣的，美國人也不喜歡他們自己的影像在其他地方被反映出來。

在那些被視為家或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裡，總有一些帝國主義的成分。環境保護主義者與規劃師有時對待整個世界，至少是自然世界，有如個人的財產。席拉俱樂部 (Sierra club)，野外的經理者，就持此種態度。正如觀光客所言，義大利除了對義大利人外，確實是個好地方 (Barzini, 1964)，這是因為環境保護主義者認同於野外更甚於對同胞的認同。

當我們遠離家鄉，對異地的瞭解越是無法確定。個人的參與隨著距離減少；我們試著從熟悉事物類推，運用定型的線索與範疇，總是無法成功。當社會意義變成從新聞媒體、小說或學術報告所摭取的不真實的傳說與印象時，我們就愈依賴表象來學習事情的真實。

異鄉並不只是距離遙遠的地方，它也指我們都市裡那些我們所不瞭解的次文化地點。如今我們視地景為提供視覺愉悅與休憩經驗的場所。地景的社會意義與目的已漸被忽視。農人、採礦者、伐木工人認為自然是可以使用的東西，所謂好的地景，不論是否好看，重要的是能否發揮此功能，但都市居民卻無視於此，於是產生了衝突。

歷史環境通常在其原有的社會象徵意義已被遺忘後，才為人喜歡。那如何解釋印尼在獨立30年之後開始保存其殖民時代的建築以及列寧格勒所保存的沙皇王宮呢？這些建築已不再保有原來令人敬畏的社會意義。它們已變成共有財產的一部份，因美學理由、浪漫聯想或愛國熱情而被人喜愛。

遊記代表了我們對異地的態度：依賴印象與外觀，理想化的敏感，以小見大，與未經長期接觸和深刻體驗的刻板印象與傳說的流行。這些在未知中探險的旅客可能覺得驚恐，在陌生的表層下可能藏著令人不悅的社會事實與敵意。然而許多人渴望藉尋求真實和接觸未知以測試浪漫的



想像，或拓展經驗，尋找一個新的認同的家。馬卡內（MacCannell, 1976）即表示，旅遊是現代人尋求認同的表現。

雖然是過度簡化，但我們對家園與異鄉的看法確實存在一套模式。家即使有創傷、缺陷與問題仍為我們瞭解與喜愛，因為它是我們的一部份。鄰近地點影響我們的生活，可能是威脅或是機會。我們的態度總是極端化。異鄉由於較不重要，不構成威脅，因而可以理想化。這種態度在時間的向度也是如此。現在屬於我們；剛剛消逝的過去要加以反叛；遙遠的過去則是英雄與黃金時代。真正的態度比這個更複雜，也有許多例外，但仍可區別不同的模式。

雖然我們依賴外觀以解釋社會事實，甚至我們可能穿透展示的前台而捕捉到意外的訊息，但仍無法保證外表與事實是一致的。我們常無法閱讀某些次文化的密碼。即使是人類學家對於同一種族或鄉民文化之意義的解釋，仍是意見分歧。例如雷德夫（R.Redfield）與路易士（O.Lewis）對鐵波茲連（Tepoztlan）的歷史性辯論。（註二）

## 回饋

大部份有關環境行動的爭論發生在建造之前或設計過程中。此時反對者能夠較有效的阻礙或修正行動，或者提出另一替代方案。通常媒體所展現的未來行動影像總是與最終的行動不同（Appleyard, 1977a）。

環境溝通常只是單向過程。如果有人建造房子，傳達了人們所不喜歡的訊息，並無簡單的回應方式。破壞和在牆上塗劃不是有效的保護；毀壞是危險的，且違法又費錢。改變使用、名稱與符號，或興建新的建築比毀壞舊的房子是更常見的方式。但是現存的城市會對文化產生持續的影響，這是很難避免的。

## 政策涵義

1. 實質規劃與設計者應體認到，自明性、認可與權力是人們的基本需求，且必須在實質環境上獲得表達。地點裡的自我感比地點感更加重要。可意象性不只是都市的美學品質，或辨認方向的方法，更是都市象徵系統最有力的屬性。美學不是抽象的品質，而是與不同團體的價值和品味直接聯結。

2. 社會學家與社會計劃者應認識到實質環境在市民社會生活裡扮演的重要象徵角色。實質環境可以和就業、犯罪或經濟同等重要。最近舊金山的一次調查顯示，住宅的整潔（與自尊聯結的品質）和確保安全防止犯罪一樣重要，且比房價更為重要。規劃政策裡社會與聲望的意象可能被視為不道德或微不足道的，但是現在應該認為它是人類

的基本需要，儘管馬斯婁（Maslow, 1968）的價值層級仍為事實。

3. 技術規劃與環境決策不只基於價值，同時也建立在認同的基礎上。換句話說，實質規劃決策經常僅經由擴張領域，建造或破壞建物，或只是植樹、油漆房屋，因而增大某些人的權力，威脅另一團體的自明性與地位。環境可以分成“我們的”和“他們的”，樹可能是我們的，廣告牌是他們的，真品是我們的，贗品是他們的，市中心可能是我們或他們的，野外、石油以及其他自然資源也是如此。都市與自然環境為社會象徵衝突的舞台，也因此引發有關社會正義的議題。

4. 環境決策中的民衆參與非常重要，唯有如此，人們才能認同於新的環境行動，擁有並覺得有責任感。它減少了疏離。

5. 許多研究課題因此產生。環境行動應在何時，由何人實行以支持其自明性，或作為溝通的方式？環境行動者對它瞭解多少？人們對聲望與認同象徵的需求與評價的程度為何？應傳達何種訊息？表現期望的認同並隱藏不想要的，其主要方式為何？在不同的狀況下，社會及經濟事實與環境經驗的關係為何？人們如何閱讀都市？他們瞭解多少？近來一些研究發現，低收入居民在受到壓力的狀況下喪失了所有對於為何鄰里發生這些事情的意識，他們的環境的因果模型已消失了。如何引導居民以瞭解其環境建造及毀壞的過程？何時居民會感覺到環境是屬於他們的？……還有其他許多問題。

如果我們想敏銳的瞭解環境是如何被使用及解釋為社會象徵，這些只是需要探討的一部份課題而已。

## 註釋

註一、「象徵」（symbol）與「記號」（sign），這兩個字的用法，非常的混淆。記號學家視環境為一套記號系統，而記號學（semiology）就是研究記號的科學（Barthes, 1964; Hawkes, 1977）。本文採用一些結構主義與語言學的概念，但建立在經驗與社會的思考形式上。記號的口語用法較象徵狹隘，本文不予採用。本文也無意探討榮格（Jung）的文化與基型象徵或佛洛伊德（Freud）的象徵概念，但也不否認此二者可能亦是計劃師所必須瞭解的意義（如Cooper, 1974）。

註二、雷德夫（R.Redfield）於1920年代研究一個墨西哥鄉村鐵波茲連（Tepoztlan），他解釋此村為由滿足、適應良好的居民所組成的同質、孤立、穩定運作而完整的社會。17年後路易士（O.Lewis）的研究卻提出暴力、破壞、殘暴、疾病、痛苦與

不適應的證據。稍後二人都承認此差別並非由於狀況改變，而是由於個人因素——發展人類學方法時，準備與觀點的不同（Redfield, 1955）。

### 參考文獻

- Ackerman, J.  
1961 The architecture of Michelangelo. New York: Viking Press.
- Appleyard, D.  
1976 Planning a Pluralist 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77a "Understanding Professional Media: Issues, Theory and a Research Agenda." In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Vol. 2), eds. I. Altman and J.F. Wohlwill.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7b "High Rise Buildings Versus San Francisco: Measuring the Visual and Symbolic Impacts." In Behavioral Response to Tall Buildings, ed. D. Conway.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and Ross.  
1978a "H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288.  
1979a The Conservation of European Cities. (Introduc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1979b Livable Streets: Protected Neighborhoo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c "Urban Trees: What do They Mea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Urban Forestry Conference, November 197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Forest Service.
- Bandarin, F.  
1979 "Planning and Conservation in Bologna." In The Conservation of European Cities, ed. D. Appleyar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Barthes, Roland.  
1964 Elements of Semiology. Paris: Seuil, (Trans. A. Lavers and C. Smith. London: Cape, 1967).
- Barzini, L.  
1964 The Italians. New York: Theneum.
-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London: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 and Harmondsworth: Penguin.
- Brower, S.  
1965 "The Signs We Learn to Read." Landscape. Autumn: 9-12.
- Castells, M.  
1976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Clay, G.  
1973 Close-up: How to Read the American City. New York: Praeger.
- Coopet, C.  
1974 "The House as Symbol of Self." In Designing for Human Behavior: Architectur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eds. J. Lang, et al.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and Ross.
- Douglas, M.  
1973 Natural Symbo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Duncan, J. S. and Duncan, N. G.  
1976 "Housing as 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In Environmental Knowing, eds. G. Moore and R. Golledge.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and Ross.
- Dyer, D.J.  
1975 Housing in Third World Cities. London: Longmans.
- Edelman, M.  
1971 Politics as Symbolic Action: Mass Arousal and Quiescence. Chicago: Markheim.
- Ehrenzweigh, A.  
1965 The Psychoanalysis of Artistic Vision. New York: Brasiller.
- Engels, F. Manchester  
1944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Trans. and eds. W. O. Henderson and W. H. Chaloner. 1958 London: Blackwell.
- Firey, W.  
1947 Land Use in Central Bost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ans, H. J.

- 1968 People and Plan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ffman.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 Goodey, B.  
1979 "Toward New Percep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Using the Town Trail." In The Conservation of European Cities, ed. D. Appleyar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Goodman, R.  
1971 After the Plann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Gulick, J.  
1963 "Images of an Arab C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29: 179-198.
- Hawkes, T.  
1977 Structuralism and Semi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ackson, J.B.  
1967 "To Pity the Plumage and Forget the Dying Bird." Landscape 17: 1-4.
- Jakobsen, R.  
1960 "Closing Statement: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tyle in Language, ed. T. Sebeok.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King, A.  
1976 Colonial Urban Development: Culture, Social Power, and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Lynch, K.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 MacCannell, D.  
1976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 Maslow, A. H.  
1968 Towards a Psychology of Being.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 McWhirter, N., and McWhirter, R.  
1976 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 (Giant 1976 Edition). New York: Bantam Books.
- Mead, G. H.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les, A.  
1966 An Information Theory of Esthetic Perception, Trans. J. Cohe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Newman, O.  
1972 Defensible Space. New York: MacMillan.
- Packard, V.  
1957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D. McKay.
- Raban, J.  
1974 Soft City. London: Collins.
- Redfield, R.  
1955 The Little Community: Viewpoints for the Study of a Human Whole. Uppsala and Stockholm: Almqvist and Wiksells Boktryckeri Ab.
- Solzhenitsyn, A. I.  
1968 The First Circl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teinitz, C.  
1968 "Meaning and Congruence in Urban form and Activ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4: 233-248.
- Suttles, G. D.  
197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eblen, Thorstein.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The Portable Veblen, ed. M. Lerner. New York: Viking Press.
- Webber, M. M.  
1963 "Order in Divesity." In Cities and Space: The Fulure Use of Public Land. ed. L. Wing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 Williams, R.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